



第2版

第一、二版责编 李念 版式 袁琼璐
2016年10月23日
Email: wenhuijiangtang@163.com

文匯講堂



郭小凌：总是从“边疆”出发

■文/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陈超

1980年9月的一天，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郭小凌拿着希腊字典，啃读着色诺芬的《长征记》，虽然移目很慢，但悲壮感跳过纸面直入内心：希腊战将色诺芬带领5000残余希腊雇佣兵逃至滔滔的攸克星海（黑海）旁，徘徊中立誓回归。放下字典，他眼前不禁浮现出自己在祖国北大门内蒙插队的情形。作为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后的首届学生，谙熟俄语的他，28岁从头开始学希腊语、拉丁文，尤其是英语。

然而只要是出发，一切都不晚。即将迈入66岁的郭小凌生命中就这样经历了众多的“出发”，而且大多始自偏于一隅的“边疆”。上山下乡是从城市到北部边疆；学习历史，“被选择”了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古希腊罗马史；留在北师大教书，又在历史系首开“西方史学史”课程；新世纪后，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他又转入文博领域，开始跨界的耕耘。“边疆”，通常是荒凉和人迹罕至，然而，郭小凌总以意志、智慧和沉着，拾掇得“此地风景独好”。

在祖国的北大门感受生命潜力的奇迹

荷马曾留下两部不朽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讴歌人与自然，与命运的争斗，悲壮而雄伟。郭小凌读研时多次阅读，时有共鸣。他的插队时光，带给他最强烈的印象便是：人的潜力难以预测。

1968年，在中学闹了两年革命之后，郭小凌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内蒙插队务农。自小生活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他，陪伴的是浴缸、抽水马桶，面对传统的旱厕和原始的冲水洗浴，他自然有“强扭”的适应。然而，群体生活和18岁青年人的好奇心逐渐冲淡了不适。和记者交谈时，他比较莫言对家乡的描写，“有些晦暗，我觉得农村有不少欢快的记忆，农民常常像快乐的鸟儿。”他还补上一句：“你知道贝多芬有出名剧‘鸟’的哦”。农民扩展了他对世界的认知。或许是因为这段经历，他在成为学者之后，总是能够从多个角度分析一个问题，从不偏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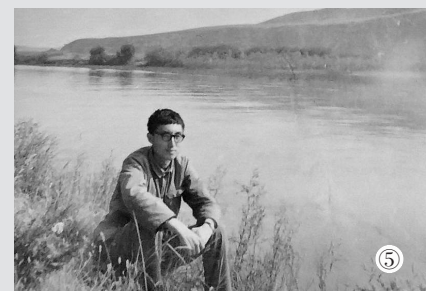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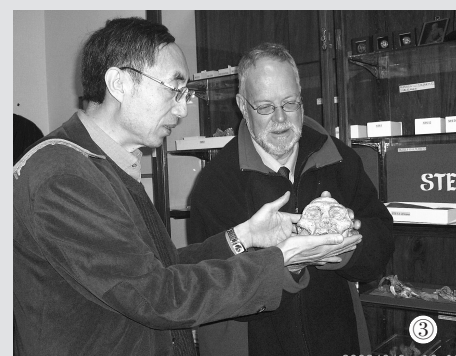
他身高一米八九，在农村被视为壮劳力。繁重的体力劳动，播种、锄地、收割、打场、挑粪、撒肥、出民工等等活计，样样不落。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扛着重达200斤的粮袋走过颤巍巍的木板，将粮食倒进粮库的粮囤，完成每一年农村生活中的最具核心意义的仪式——交公粮。“扛两百斤重的粮食现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在当时就如奥运会的举重选手一样，一下子就冲破了极限。”采访中，郭小凌不无幽默。这样的体验使他惊讶，他意识到，人忍耐痛苦的能力可能远超出自己的想象。这样的能力和记忆从此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相随左右。

农闲时间，郭小凌会和同公社的下乡知青读书，通过传阅和手抄等形式，大量阅读书籍，其中包括他至今津津乐道的茅盾、巴金、大小托尔斯泰、雨果等人的作品，为日后的文史写作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同样是50年出生的廖申白在东北农场为工友读解马恩哲学典籍，日后成为古希腊哲学教授；另一位50年生人，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在插队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

“文革”终止了日常的教育系统和教育方式，但下乡知青对知识的渴望，如同顽强的生命潜力一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展开着。冥冥中，他们期待着寒冬结束，冰雪消融之日。

28岁学英语和希腊语为读世界古代史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68年“七二一”讲话后，1975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来到郭小凌任教的呼和浩特二中。吉林大学招生老师来面试，



- ①郭小凌（一排右）在首尔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中日韩首都博物馆年会合影
- ②郭小凌在麻省理工大学图书馆
- ③郭小凌与自然史博物馆馆长观赏世界遗产和南非国家南方古猿非洲种的头盖骨
- ④郭小凌在野外考察
- ⑤郭小凌在农村

“他当时问我对张春桥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如何看？我的回答大概还让他满意吧”。在吉大，他遇到了古代史大家金景芳、近代史大家李时岳等吉大历史系的名师，后者一度希望他能够留在吉林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科研。

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临毕业正值恢复研究生招考，他幸运地进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史系读研。考研究生，除了专业课，还须考外语。“俄语帮助了我，初中三年，我俄语常考100分。那时大家外文水平都不高，我还算凑和。”他在廖学盛先生指导下，开始世界古代史的学习和研究。

近几年，国内刮起了一阵古典风，对西方古典学和古典历史的引介和研究蔚然成风。但在1978年，国人对于古典学和古典世界的兴趣并不高。由于文革十年的摧残，建国后林志纯先生等老一辈学人“暴霜露，斩荆棘”建立的学术阵地大大萎缩，人才培养更是青黄不接。“百废待兴”可以用来形容当时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状态，在世界古代史的研究领域尤甚。像一棵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的幼苗，学科本无太多积累，又与外界脱节甚久。这一年，已经28岁的郭小凌，仿佛再次来到了一个天地茫茫的边疆——一个学术的新边疆。

与地理的边疆不同，学术的边疆无法离开，只能坚守和耕耘，只能默默地播撒种子和希望，静静等待边疆变成沃野。廖先生将他像种子一样种在学术的边疆，期待他日后也是播撒种子的人。在研究生院入学不久，他便开始了学习英语的征程。“当时我已经28岁了，却还要从ABC学起，连做公交车都抱着单词本”。他后来经常提及此事，以勉励学生与后学，学习永远不嫌晚，坚持总会有回报。

在阅读苏联学者关于古希腊城邦的军事制度的著作时，特别是古代军事史专家马利诺维奇的专著和论文后，他发现关于希腊军事制度仍有可以探讨的余地。于是，他的题为《古希腊城邦的军事制度》的硕士论文顺利展开，并幸运的成为社科院世界史所

第一位答辩的硕士研究生。因为是研究生制度恢复以来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第一个毕业生，所以答辩当天，会议室挤满了人，不但所长、书记到各研究室主任及研究人员悉数到场，还有前来参加答辩的外审专家，如北师大的古史大家刘家驹先生与李雅书先生。“我紧张得满头大汗，那阵势和重视的程度后不见来者”。

由古希腊史增添西方史学史研究

1981年，郭小凌顺利地成为世界古代史研究重镇北师大历史系的助教，和刘家和、李雅书等前辈成了同事。他边上课边积累，十多年后，他成为了播种的人——可以带研究生了。郭小凌并不强求学生，总是以鼓励为主，尊重学生的选择，所带学生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古希腊史，还包括古罗马史、史学史，甚至包括古埃及史。即便那些并未走上新学术道路的学生，也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为学为人的道理。

除了鼓励学生开垦学术新边疆，郭小凌自己也勇于在学术研究中开疆扩土。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古希腊的军事制度，但他并不固步自封，学术疆界很快就扩充到古希腊的政治人物、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以及古代的经济社会、古代的历史书写，他还对古代社会的奴隶制、古代国家的形成做过研究。除了对具体案例的分析，郭小凌对史学理论和方法也相当有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到当下流行的后现代史学均有涉猎。在《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一文中，他对古代史料做出了非常具有原创性的批判和分析，被美国德堡大学古典系主任刘津瑜赞为“颇具价值”。

研究领域的逐渐扩大，最终使他突破了自己研究的疆界和藩篱。1993年，北师大历史系需要人教授西方史学史这门课。郭小凌自告奋勇，主动承担课程的讲授。他在这个方向上有一定优势，一是外文见

长，二是因为古希腊罗马史家在西方史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和大量篇幅，一般研究西方现当代史学的学者对此普遍隔膜。聪明而勤奋的郭小凌很快担起这份重任。为了方便教学，他在西方学者的基础上完成一部完整而翔实的《西方史学史》。那年郭小凌45岁，很多人哀春伤秋、陷入中年危机的年岁，他再一次从新的学术边疆出发。在北大，这门课成为最受学生追捧的课程之一。专著《西方史学史》连续三版，成为国内流行的西方史学史教材之一。

兼职首博馆长实践新使命展示历史智慧

时势造人。如同生命的潜力在非常时刻才惊艳，人生的道路也未可预知，等走到三岔路口了，才知道那也是一种抉择。55岁的郭小凌跨界担任首都博物馆馆长，从历史教学走向文明展示与交流。回顾担任馆长这11年前的机遇，复盘仿佛在阅读另一本人生传记，郭小凌却爱低调看待。

2005年，首都博物馆在复兴门外大街的新馆建成，市政府希望有一位既懂世界历史和文化，又能进行外语交流并有一定行政经验的新馆长。当时郭小凌正担任北师大史学研究所第三任所长。前两任是创所人白寿彝先生，以及龚书铎先生。此前，他还担任过三届历史系副主任，主管相应的行政工作。机缘巧合，他成了首都博物馆新馆的第一任馆长。“我担任馆长是一个特殊安排。”采访中，郭小凌谈及自己是兼职馆长，“只负责主持办公会议，参与博物馆治理和面上的业务活动，并不是法人代表，主业依然是北师大教授。但随着时间推移，兼职的副业成了主业。”

外语和专业上的长处在对交流方面自然会有一些帮助。例如，法国卢浮宫是古希腊文物精品集中的博物馆。2006年卢浮宫的“希腊、罗马和埃特鲁里亚展馆”正在维修，展线上的展品撤下闲置。郭小凌获得这一信息，借出访之机同卢浮宫达成借展意向。经过两馆工作团队的反复协商，在北京市政府和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最终达成协议，于2007年成功引进了《卢浮宫珍藏展：古典希腊艺术》。该展览分为“生活在古典时代”、“古希腊人的神灵世界”、“与希腊名人对话”三个单元，生动展示了古典希腊男性、女性及家庭日常生活的情状，以及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和杰出政治和文化代表人物的风采。展品中不仅包括著名的“持金苹果的爱神”、“逗蜥蜴的阿波罗”等大理石雕像，以及荷马、苏格拉底、亚历山大等杰出人物的标准像、典型彩陶瓶等文物，还有一些首次出国展出的艺术精品，如“帕特农神庙的雅典娜”、“战神阿瑞斯”等大型雕像。这是继2006年首都博物馆《大英博物馆250年珍藏展》后又一次难得的西方古典艺术精品展，取得骄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10年，休伯特·华士与苏珊·华士夫妇希望能将自己的祖父、杰出荷兰画家胡博·华士的6幅肖像画捐赠给中国，后者曾为荷兰女王、朝鲜国王、慈禧太后绘制过肖像。并无明确方向的夫妇俩飞赴北京，实地考察了若干博物馆单位。首都博物馆可靠的保存和展陈条件、接待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诚恳态度吸引了他们，而郭小凌与他们的英文交谈也颇为投机。两位老人最终决定将有关中国的6幅画作，包括李鸿章、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的肖像画落户首都博物馆，在北京一时传为美谈。

改变历史观：华夏文明的位置在哪里？

“对我个人而言，博物馆馆长自然是不可多得的人生经历。”在郭小凌看来，这一经历使他获益甚多。一个明显的观念改变是对古代华夏文明的高度敬意。

五四以来，国内学人中有一种看高古代西方文明成果、看低古代华夏文明的倾向，（下转第3版）